上海工人的抗日救亡斗争

张　祺

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抗战期间，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各界人民一起，不断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前进，并在斗争中发展和积蓄了革命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一

八一三战火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到处狂轰滥炸，工厂化为灰烬，居民死伤枕藉，闸北变成一片瓦砾，南市等地遭到严重破坏。上海人民面对日军的暴行，同仇敌忾，汇成了抗日救亡的洪流。许多在日商工厂企业里的中国职工，包括在日本人家里的厨师和女佣等都拒绝为日本人工作，自动弃职。全市各行各业的职工响应党的号召，纷纷行动起来，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党中央派刘晓、刘长胜同志来上海，着手重建江苏省委，领导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斗争。在党领导下，工人界、职业界、妇女界、文化界和教育界以原有的救国会为基础，建立了各自的救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协会，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一时各种形式的战时服务组织和救亡团体纷纷宣告成立：前者如印刷业、银钱业、百货业、商务、法电等职工组成的战时服务团；后者如纱厂工人救亡协会、人力车夫救亡协会、邮局职工的职业界救亡协会邮政组，以及跨行业的沪南青年救亡团、沪西国民战时服务团等。他们同各界救亡团体相配合，开展抗日宣传，募捐献金，救济难民和支援前线等各项工作。汽车司机驾驶公共汽车、出租汽车上前线输送弹药，救护伤兵；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为军队运送、装卸物资；轧石工人在防线上挖战壕、筑工事；许多职工在炮火中承担了救护伤兵、救济难民的义务，把工厂变成战斗堡垒，把工房当作前线医院，把剧场旅社辟作难民收容所，不少人为此而献出了生命。同时党组织通过各界救亡协会、各个救亡组织和难民收容所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培养和发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为进一步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准备了条件。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由于形势变化，救亡运动必须相应地转变活动方式，以利于保存和发展党的力量。我们根据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到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公用事业上，放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厂企业以及敌人的军工生产和经济要害部门中去，使救亡运动深入到基层，把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一九三八年起，随着日商纱厂和日军占领的工厂先后恢复生产，一些英美企业也陆续复工，租界里还开办了一批新的小型工厂，租界经济一度出现畸形繁荣的局面。这时我们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尽量争取进厂，并说服他们设法打入那些日商和日军直接管理的工厂,同时千方百计与公共交通、邮政、电话、电力、煤气、自

来水等公用事业单位的职工加强联系，扩展党的阵地。这样，通过贯彻‘面向产业,深入基层’的方针,使党的力量很快深入到工厂基层，党员迅速扎根于群众之中。在地区上，有步骤地从沪东沪西向吴淞、江湾、浦东、南市以至龙华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发展,伺机打入这些地区的工厂，做好开辟工作。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在全市纱厂、造船、机器、印刷、绸厂、烟厂、橡胶和公用事业等主要行业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建立了党的组织，团结群众，坚持抗战。

以上这些主要产业中的开辟工作，都是围绕抗日救亡斗争进行的。例如同兴二厂开工后，党员即进厂活动，建立了救亡协会，会员达五十余人，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党员。英商纶昌印染厂工人中的一些抗日积极分子，通过反对敌伪企图扩大劳资纠纷、破坏复工的斗争，被吸收入党，建立了党支部。这样的例子很多，说明广大工人在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迫切需要党的领导，而党也正是在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的斗争中，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从而壮大了党的力量。

一九三九年以后，上海的形势日益恶化，情况非常复杂。一方面，敌伪势力渗入租界，暗杀和绑架抗日爱国人士，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企图攫夺英美在沪利益，以利于发展战时经济体制；另一方面，物价飞涨，一部分不顾大局的资本家加重剥削，劳资纠纷增多。面对这样的形势，全市职工在党的教育下，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尽量通过谈判解决劳资争议。即使发生罢工，也采取克制态度，及时求得解决，以抵制汪伪工会企图借机发展势力。这样，不但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对敌，而且提高了职工的政治觉悟，培养了一批能掌握政策的干部。与此相反，我们对敌人

则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坚决予以打击。比如日军于一九三九年租用出租汽车，秘密绑架爱国人士，因害怕暴露真相，把三名司机杀害灭口。我们抓住敌人这一暴行，在云飞、泰来、祥生、银色四大出租汽车公司发动群众，组织了一次特殊形式的“大出丧”，上百辆出租汽车挂着花圈挽联，后面跟着一千多人的送殡队伍，在租界马路上缓缓行进，形成了一次特别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公开揭露和控诉了敌人的暴行。上海工人救亡协会为此发表宣言，予以声援。这次斗争加强了四个公司职工的团结，鼓舞了全市人民坚持抗日的信心。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上海从此进入更黑暗的时期。我们认真贯彻党的“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势利导地发动群众，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通过联谊社、互助会、合作社以及兄弟会、姐妹会等形式团结群众，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抗日救亡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向纵深发展。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党在工厂系统中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发展。抗战初期工厂系统只有党员几十人，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发展到七百五十人（不包括输送去根据地的）。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一批外商企业为日军占领被迫关厂以及组织暴露等原因，一批党员和群众撤退到根据地，党员一度下降为五百余人。在此后的几年内，我们坚持边巩固边发展，党员队伍又逐步扩大，到日本投降前夕，已有近八百名党员，通过他们联系，团结广大职工群众，形成了一支迎接抗日胜利的坚强队伍。

二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类型的平民学校和劳工夜校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重要阵地。党员在这些学校中，传播革命理论，提高职工文化水平,开展群众工作,受到职工的欢迎,并取得合法地位。即使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也能站稳脚跟。

抗战爆发不久，我们就通过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地方协会和男、女青年会以及社会上层人物等各种渠道，得到租界当局批准并筹集了一部分经费，兴办了劳工夜校、职业补习班、成人义务学校以及各种讲座、训练班，吸引了广大职工。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神州职业夜中学，这所学校由职业界救亡协会的许德良同志负责，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办了两年半时间，先后入学的职工有上千人。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开设中学班、补习班和职业班、英语班,还举办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以及抗日游击战术等讲座(实际上就是训练班),彭柏山、马纯古、韩念龙、刘宁一等同志都为该校讲过课。学生中有来自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和党员，还有失业和失学的青年。他们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坚定了抗日救亡的信念，其中不少人成为抗战时期的领导骨干。

为了适应开展职工教育的需要，党曾经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史话》、《中国地理》等十多本职工读物，作为劳工夜校的教材。因为文字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

当时全市的劳工夜校不下二、三百所，多则十几个班，少则一个班。教师大多数是党员和积极分子。学生来自各行各业，其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些是党员和进步群众。这些学校不但是教师的活动阵地，也是职工相互切磋相互促进的场所。有些原先没有党员的空白单位，就因为有工人在夜校读书入了党，回去打开了局面。

当时规模较大、开办时间也久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夜校，还有女青年会的劳工夜校。该会在沪西三和里等处设立了六所分校，每所分校每学期上学的少则几十人，多则二、三百人。师生中党的力量较强，课余活动和各种团契、校友会等搞得有声有色。许多工厂的女工,不顾一天劳累,冲破家庭阻拦,坚持到夜校读书,参加救亡活动。另有一些有条件的大厂，如新裕纱厂、永安三厂、上海电力公司等单位，还在本厂党员和工人群众的积极推动下开办了职工夜校。全市经常在校读书的职工达数千人。

劳工夜校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些专职教师每月仅得到为数不多的津贴，生活十分清苦。至于兼职教师，更是完全尽义务，分文不取。前来上学的工人，生活也同样艰难。然而大家在党的领导下，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在思想上互帮互学，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亲如家人,情同手足,齐心协力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排除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坚持办好职工教育，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值得大大发扬。

一九四〇年，刘长胜同志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回沪后向我们作了传达。他说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敌伪统治地区，一个工厂办一所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求进步,就等于办了一个工会,夜校工作值得提倡和推广，要继续办好它。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评价，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下，绝对不许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所以劳工夜校就成为团结和教育群众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形式。实践证明，劳工夜校是党联系群众、开展群众工作

的阵地，是党传播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开展党的工作的基地之一。它引导了大批职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

三

上海工人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同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相互支援的。从上海沦陷到抗战胜利，上海人民在黑暗的年代里，始终把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抗日武装斗争上。因此在抗战期间上海职工自始至终地支援我军武装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而新四军开辟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又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坚强后盾和可靠的后方，有力地支援了上海人民的斗争。

当上海职工听到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后，就有成千人长途跋涉，辗转到了皖南。当新四军挺进苏南，建立茅山根据地，在京沪沿线和上海近郊开展游击战争时，胜利的捷报又给坚持敌后斗争的职工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各行各业的职工鉴于国民党政府无理限制新四军的给养，自觉开展献金运动,每月少则一、二角,多则一、二元。二、三年中,总计献金三十余万元。此外，征募寒衣，筹集药品，悉数送往根据地，充分表达了上海职工拥护党和人民军队的心意。我们通过支援新四军的工作，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各种支援组织，把群众团结起来。

一九三九年夏，新四军为了加强军队和地方工作，需要补充一批干部。我们根据江苏省委的要求，一次就送去了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二十多人，以后又陆续输送了大批党员和进步群众。为

了解决根据地的军工和民用生产需要，我们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动员了纺织、面粉、日用工业品、卷烟、医药、印刷,直到修造枪炮的各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前往抗日根据地工作。根据地创立银行准备发行货币的时候，需要印刷人才，派原印联负责人赵鼎来沪动员印钞工人前往支援。他和我谈起，仅据他所知道的，上海印刷系统动员去根据地的约有一百多名党员和一千多名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对建设根据地，特别对印钞、出版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敌人猖狂进攻的时刻，新四军和郊县游击队的伤病员，因根据地条件不足，送来上海治疗。上海有关医疗机构及私人诊所采取各种保密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经过医务人员悉心治疗，使他们恢复了健康，又意气风发地重返前线战斗。

抗战八年，上海职工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军的人数很多。皖南事变之前，各行各业的职工到“江抗”和苏中、崇明、青浦、嘉定、浦东等地参加游击队的，仅以一个交通站为例，就有二千人。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就是以上海工人和青年为主体组成的，他们骁勇善战，曾得到谭震林等领导同志的表扬。

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敌伪实施恐怖统治，企图破坏我们的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有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因身份暴露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先后设法让他们及时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避免了损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形势日益恶化。江苏省委奉命撤往淮南根据地，建立了城工部，继续领导上海的群众运动。一九四二年后，我们分批从上海撤退了一批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城工部为此举办了多期干部学习班，使这些来自上海各行各业的

工运干部得到学习和总结经验的机会。根据需要，这些同志被分配在当地或派回上海工作，对开展上海工人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至一九四四年夏，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我们分批动员和组织了非党群众领袖和知名人士去根据地参观，那里的党政负责同志向他们介绍了形势和根据地的情况，使他们受到极大鼓舞和深刻的教育。他们回来后就把所见所闻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提高了广大职工对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抗战接近最后胜利时，上级党指示我们迅速发动群众，组织地下军，准备在必要时以武装起义响应全国总反攻，积极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我将这个指示精神，向沪东、沪西、浦东、吴淞等地区和有关产业的骨干传达后，各处筹建地下军的工作都积极开展起来。浦东地下军得到了新四军淞沪支队的支持，帮助训练了骨干，支援了武器。地下军又智取了浦东日军军火库中的一批弹药，支援了淞沪支队。后来武装起义奉命停止进行，但在以上行动中，又一次体现了上海职工与新四军建立起来的战斗友谊。

抗战时期，上海工人的抗日救亡活动，唤起了成千上万群众的政治觉醒，提高了广大职工的阶级觉悟，锻炼了一支忠诚的、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干部队伍，为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胜利积聚了力量，提供了经验，打下了牢靠的群众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当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工人，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作出更大的贡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海职业界支援新四军抗战

陆志仁　谢胥浦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很快掀起了高潮。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工商界、职业界、教育界和学生界已分别成立了不少抗日救国组织，开展了各种宣传和集会活动。有十七个行业准备联合组织抗日救国会。有不少工厂、商店和学校组织了义勇军，进行训练、检阅等活动。上海市商会还成立了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开展查禁日货运动。当时上海各大报经常刊登这些救国活动的消息。这些抗日救国组织和活动，发自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有不少中共党员、共青团员进行活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提出广田三原则，发动了冀东事变，企图实现华北特殊化。同时，大量日货不断侵入我国市场，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接着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联合抗日十大纲领。这两个宣言发表后，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国情绪更加高涨，都要求救亡图存，共赴国难。北平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对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以文委领导下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中心，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

界人士，推动了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成立。从一九三五年底起，先后成立了国难教育社和文化界、职业界、学生界、妇女界以及工人等救国会组织，上海的抗日救国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一九三七年七七、八一三全面抗战后，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推动下，先后成立了上海文化界、职业界、教育界、妇女界和工人救亡协会，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了各系统组织的领导。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举行成立大会，出席的团体代表和个人会员共二千余人。大会通过会章，并推举沙千里、潘仰尧、杨经才、李文杰、朱静安、杨伯庚、骆清华等九人为理事，设组织、宣传、社会服务三个部，沙千里兼组织部长，李文杰、黄逸峰任宣传部正副部长，王纪华、周肇基任社会服务部正副部长。职协成立时有团体会员二十八个，其中群众基础较强的有：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海关同人乐文社、工部局华员俱乐部、上海职业妇女会、上海各业员工战时服务团、量才补习学校、第二及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同学会、蚁社、精武体育会等团体。职协成立后，先后由王纪华、袁清伟、王明扬、石志昂、许德良等组成党组(当时称党团)，以职协公开名义，具体领导各项工作，曾出版会刊《第一线》，并创办了神州职业夜中学。团体会员也续有增加，如益友社和绸布业、新药业、酒菜业、五金业、海味业等职工联谊会，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八一三抗战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对国共合作问题也发表了谈话，表示承认中共宣言。宋庆龄曾在上海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拥护国共合作抗日。随后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中共鉴于国

民党政府开始对日作战，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实现，根据两党谈判协议，将红军主力三万余人，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分别至晋东北、晋西北和晋东南抗日前线作战。同时，分布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一万余红军游击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南昌成立军部，直辖四个支队。同年四月间，军部移驻皖南岩寺,一、二、三支队在皖南泾县集中,四支队集中于皖中舒城地区。不久，四个支队分别向敌后挺进，先后开辟和建立了茅山地区和苏南、苏北、苏中以及浙东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后来四个支队在战斗中发展至七师之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八一三抗战后，上海职业界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团结了各行各业的广大店职员，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支援前线和新四军抗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将大致情况分别忆述如下。

组织战时服务团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职业界由顾准、雍文涛、陆志仁组成党的职员支部委员会，顾准为书记（后改组为总支，即中共江苏省委职员工作委员会的前身），领导职业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战起，各行各业纷纷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团结广大群众参加活动，成为人民参战团体的组成部分。

当时店职员组织的战时服务团很多，如上海各业员工战时服务团、洋行华员战时服务团、银钱业职工组织的银钱业同人战时服

务团、百货业战时服务团、煤业组织的红十字会救护队、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人以地方协会名义组织的运输队，以及其他商店、企事业单位职工组织的战时服务队等等。这些战时服务团体，一般都采取组织救护队、担架队、宣传队、慰劳队等形式开展活动，支援前线，为抗战服务。例如百货业战时服务团组织部分职工学习救护知识，练习包扎等操作，曾三次到上海近郊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并在战地救护伤员。当谢晋元团附坚守四行仓库时，还组织职工不顾危险，携带物品前去慰劳。银钱业同人战时服务团，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基础上，募得军鞋、棉背心、麻袋等二千余件，现金八百二十余元，由周晴同志带头去前线慰劳。后又募集手套一千余副、急救包一千份和罐头食品二千多听，救济难民，并和其他服务团一起，携带慰劳品慰问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同时，组织了九个宣传队，到街头宣传，到市内各大医院慰问伤病员。煤业组织的红十字会救护队，由煤业公会出面登记，调用煤商卡车五十余辆，由中共地下党员带领，开赴上海前线服务。上海抗战部队撤退后，该救护队近百人，驾车二十余辆到昆山后方医院服务，不久，由叶进明、忻元锡等同志率领该队人车参加了新四军。上海中华职教社通过地方协会关系，从有关机关、企业中调集了大小机动车一百数十辆，组织职工成立运输队，将各种军需物资运往前线，并指定医院选择一定场所，配备护理人员，救护伤病员。上海市商会和各同业公会，也与职工一起，组织了慰劳队，募集慰劳品，先后分赴前线慰劳将士。

这些战时服务团，是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的一种活动形式，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具体内容，它不仅表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和鼓励，而且起了以实际行动宣传抗日救亡和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

作用。

慰问皖南新四军

上海抗战部队西撤后不久，南京陷落，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武汉失守后又迁重庆。汪伪傀儡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后，日军采取和平攻势，不断散布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同时租界当局对爱国群众团体的活动进行限制，要重新申请登记，才可合法存在。中国人办的报刊没有租界当局发的登记证，不能出版，而抗日言论也常遭干预。在此情况下，上海人民群众中，有些人为民族存亡担忧，也有些人对抗日战争能否胜利发生怀疑，而国民党中一部分人散布“恐日病”言论也有一定影响。在此情况下，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为了坚持抗战，反对中途妥协和增强人民群众的抗战必胜信心，职委曾利用英商关系公开出版了《职业生活》周刊,《每日译报》图书部出版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西北特区特写》等小册子,文化界出版《西行漫记》等,经常宣传中共坚持抗战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战讯，还推举各界代表到皖南参观、慰问新四军，以亲身见闻,扩大宣传,教育群众。

上海各界派代表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先后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和推动下，组织了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主要成员有文化界代表顾执中、职业界代表王纪华、妇女界代表姜平和朱立波、海关代表陈琼、农民代表姚惠滋等，由顾执中任团 长，王纪华任副团长。同行的有美国进步记者杰克·贝尔登和新四军军部印刷厂厂长兼交通员陈昌吉等。慰问团到达云岭章家渡新四军驻地时,受到项英、袁国平、张云逸、邓子

恢、赖传珠、李一氓、傅秋涛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并举行了盛大欢迎会。会上,慰问团向新四军献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锦旗。慰问、参观约一个月返回上海，中共江苏省委立即指示慰问团中的党员，组织该团成员利用不同场所，采取各种形式，向上海各群众团体报告慰问新四军的见闻和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王纪华等遵照省委指示，与职委商讨后，立即组织该团成员，分别向各群众团体和有关报刊组织作了汇报。同时举办小型展览会，展出新四军赠给上海人民的战利品和照片等。《译报周刊》还出了《新四军特刊》和《新四军小丛书》,《申报》、英文《大美晚报》和《良友》画报也刊登了杰克·贝尔登提供的关于报道新四军的文章和照片，从而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推动了当时上海正在开展的节约救难、劝募寒衣、义卖义演的群众运动。

第二次组织慰问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慰问团由上海各界的救亡协会派员组成，团长吴大琨，副团长杨帆,团员有王元化(即白蚀)、王曼秀、高敏、陈化、梁山、梁世平、巴西、蒋若虹、田荒、干戈、黎吟、司徒扬、曾舟、贝岳南、舒湘、康宁、周克勤、郑大方等二十余人。慰问团在途中曾遭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和破坏，经过一番周折，于四月底终于到达新四军军部，受到各位领导的热情招待，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该团在结束参观、慰问后，绝大部分成员参加了新四军。

上海各界代表赴皖南慰问新四军，进一步沟通了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的联系，了解了中共持久抗战的主张和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经过汇报和宣传等活动，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提高了群众的认识，对增强上海人民的抗战必胜信心和推动当时的抗日救亡工作，起了有力的作用。

输送人员和物资

自新四军移驻皖南建立各抗日根据地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先后与皖南军部和茅山、苏南、淮南、苏中等根据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线，为输送人员和物资做了大量工作。八一三抗战后，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从上海输送人员和物资是工作任务之一。上海职业界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协助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配备了一批秘密交通员，并帮助建立了采购物资联络关系。

在输送人员方面，为了保证安全，当时公开与秘密的两条交通线是严格分开的。地下交通所走路线，一般是在根据地党政机关指导下选择确定，在根据地边缘地区设置了交通站，各有专人负责接待。先后输送到新四军各根据地的人员很多，除党组织分别输送党员干部，参加根据地各项工作和上海近郊游击队以外，还有青年学生、文教人员、科技人员、医务工作者和工人、店职员以及难民等，其中以职工和难民为数较多。据《上海工运简报》刊载，上海自抗战后二年中，前后已动员了五千余职工到各根据地参战和生产。一九三八年夏，输送难民去皖南参加新四军，前后三批共有一千余人。同时还在难民中选择了一批职工和学生，由中共党员带领到上海近郊和其他抗日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

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征得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主任姚惠泉的同意，以该校名义举办了现代知识讲座，前后三期，学员共有八百余人，其中大部分学员是经过职协选送的。学习后，一部分学员输送到皖南、苏南和苏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各项工作。职协创

办的神州职业夜中学曾举办两期无线电收发报训练班，学员经过训练后，都输送到新四军工作。

职业界各商店的店职员中参加新四军的，据不完全统计，仅百货业就有中共党员二百余人，群众四百余人。其中永安公司参加新四军的店员，在孤岛时期先后就有三批共十九人，第一批三人参加了新四军浙东支队，第二批六人参加了苏南新四军六师，第三批十人先后参加了淮南新四军七师。

上海输送至新四军各根据地的人员，有不少是有专门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参加新四军后，都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的重视,充分发挥了才智,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贡献,如创建电台、医院、兵工厂、卷烟厂、印刷厂、印钞厂以及学校、报社等。新四军创办的华中建设大学，从校长、教授以至部分学生，都是从上海输送去的。苏南、苏中等地区出版的报刊,如《江南》杂志、《大众报》、《东进报》,从社长、编辑、记者和漫画木刻人员以至印刷工人,也大都是从上海输送去的。参加新四军的各界人员，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经过当地党的教育培养，大多数都锻炼成优秀干部，也有不少人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输送物资方面，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人民子弟兵，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生活条件颇为艰苦，军需物资的供应尤为缺乏，需要上海支援。上海沦陷后，日伪军在水陆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设置了哨所关卡，检查来往行人和运输车船，特别是对抗日根据地，采取封锁措施，检查更严，使上海至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资运输增加困难。但中共上海地下党利用各方关系，采取各种办法，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终将物资安全输送到根据地。例如刘少文同志与姚惠泉取得联系，曾将工商界爱国人士捐献的细布七千匹、胶鞋四万余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